



首页 → 学术文章

刘崇俊,王超:走近克隆人技术:“力量型”科学范式的反思与转换*

走近克隆人技术:“力量型”科学范式的反思与转换* ——一个技术社会学的分析框架

刘崇俊,王超

内容摘要:

克隆人大讨论这场新千年的“嘉年华会”得以产生的社会机制在于“力量型”科学的路径依赖作用。从社会哲学维度审视,克隆人技术使得生命价值直接受到挑战,启迪人们对生命真谛的原始领悟;从社会权益维度考量,克隆人技术关涉到现代化运动中“人权”理念的价值诉求,敲响了“责任伦理”的警钟。克隆人技术是近代“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纵深发展,鉴于科学范式转换的理论和现实诉求,必须对支撑克隆人技术发展的人文理念进行新的文化战略选择——建构和谐的“科技——文化生态”,统领克隆技术的有序发展。

关键词:克隆人技术;技术社会学;“力量型”科学范式;反思;转换

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于以克隆人为代表的高新技术表现出全面而深层的文明忧患,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将克隆人技术提升到不仅关乎人的生命真谛、权益理念和情感价值,而且直接关乎人类文明前途的高度。一句话,克隆人问题引发了强烈的社会震撼和激烈的学术论战。在面对克隆人大讨论这场新千年的“嘉年华会”之时,我们首先得“冷眼旁观”,冷静地思考这场“嘉年华会”的来龙去脉。本文以技术社会学作为分析框架,首先探讨了克隆人问题形成的社会机制,并分别从抽象的社会哲学维度、具体的社会权益维度考量了克隆人技术面临的困境与诘难。文章最后指出,克隆人技术是近代“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纵深发展,鉴于科学范式转换的理论和现实诉求,必须对支撑克隆人技术发展的人文理念进行新的文化战略选择——建构和谐的“科技——文化生态”,统领克隆技术的有序发展。

一、克隆人问题的社会机制探源

对自然禀性的直接干预是一切近代“力量型”科学的本真内涵,而克隆人技术对人的自然生命过程的横加干预,只不过是这种“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纵深发展。起源于西方的近代科学摒弃了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取而代之的是为科学确立了新的准绳:控制的有效性。在这种功利性目标的指引下,近代以来,科学在开辟世界的过程中成为还原论和控制论的工具,一直以其控制的有效性而著称。到了二十一世纪,随着生命科学的崛起,科学的“机械之手”便自然地染指于人的自然生命过程,“科学控制和征服的意志指向一切事物时也指向了生命,生命机体出场接受‘解剖’和‘分析’”,“曾经在物理科学中行之有效、成果颇丰的还原论和控制论用来对待生命”,“在这个新世纪,对生命的还原(化简)和控制开始变得行之有效、成果丰硕”。[1]这种“力量型”科学范式的路径依赖作用在克隆人技术上主要体现在“外向性”思维习惯上。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为了避免传统哲学在本体论上的理论纠缠,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完全忽略了对人类生命的认识和探索,尤其是将人类内在的精神世界完全抛弃于科学的视域之外,而注重于对生命以外世界的研究。近代以来科学的这一“外向性”思维方式体现在二十一世纪的生命科学之上,便表现为“以克隆人的研究为发端,注重在人自身生命以外再造另外一类人的生命”,而忽略了“研究人自身的各种各样的生命性状”。[2]

克隆人技术的出现，是宏观层面“力量型”科学的路径依赖作用的必然结果，在推动这种路径依赖作用发挥的过程中，社会文化心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克隆人技术出现的文化心理因素，这才是克隆人出现的真正土壤”。[3]近代以来，起源于西方的科学技术结出丰硕的成果，从大尺度空间来看，人类信息所及范围已达到150万光年，而在微观层次也已达夸克这一粒子层次。面对强大的“力量型”科学，久而久之，在“晕轮效应”的作用下人们便形成了“科技万能”的错误印象，“技术迷恋症”、“技术性思维”也应运而生，克隆人问题即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在克隆人方案存在明显的技术难关之时，一些科学家还心存侥幸，试图通过技术改良而加以实现；在面对克隆人的伦理困境之时，一些科学家认为伦理最多只能在克隆人技术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一些障碍，它根本不是科学的手。正如周岩教授所言，“克隆技术的发展在它刚一出现人们就已认识到其中布满陷阱、前途未卜，但科技发展的惯性使得人类无力回首，甚至没有留一点准备的时间，也许理性上想去从容应对，但事实上却万难做到。”[4]

克隆人问题的出现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问题，但近代以来“力量型”科学范式的路径依赖是其产生的内在机制，而长期以来大众形成的科技依赖心理、技术性思维方式则成为其产生的土壤。在这种路径依赖的内在机制和科技依赖心理的社会机制的交互作用下，克隆人问题的大讨论成为新世纪令人瞩目的“嘉年华会”。

二、克隆人技术的社会哲学关怀：生命的回归

目前学术界反对克隆人技术的理由常常显得苍白无力，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些常规的反对理由有些浅薄，未能触及克隆人技术生命层次的终极关怀，另一方面这些理由所赖以存在的话语体系本身非常薄弱，从而在客观上导致反对的无效。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正是这种薄弱的话语体系为我们透视克隆人技术所带来的生命危机提供了契机。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话语体系都是建立在其存在论根基——对生命的某种领悟之上的，这样正是反克隆人技术的话语体系本身的薄弱，从而使得克隆人技术的“存在论”根基更容易突显出来，进而使得人们更能回到对生命、自然的原始领悟。在以“力量型”科学为先导的现代性话语体系中，我们反对克隆人技术的理由可能“无济于事”。尽管如此，我们内心仍然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暗流在涌动——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绝对抵制，它“只讲感觉、不问原因”，或许是出于人类自然禀性中对生命真谛的本真追求，也或者是来自于社会维度对生命与自然的文化领悟，这是一种建立在社会教化而习得的社会属性基础之上的文化直觉。正如吴国盛先生所言，“我们这些克隆人甚至克隆技术的反对者们，就几乎说不出什么理由了。剩下的只是一个顽固的直觉，一种无可名状但又深不可测的恐惧和不安。它之所以顽固，之所以深不可测，因为我们根本就说不出来究竟恐惧什么。愈是说不出，愈是顽固。”[5]

“科学控制和征服的意志指向一切事物时也指向了生命”，克隆人技术即为其“机械之手”，在它的面前生命交付了自己的机体。“然而生命在交付自己的机体时并没有完全交出自己”。克隆人技术试图以“机械之手”对于生命特性进行摆布，然而摆布生命只表明在应然状态上将自己型塑成某种既定的模式，但在实然状态上生命并不一定成其所是，更多的情况是恰恰相反，“在生命机体的解剖和分析已经进入了分子水平，生命机体不可解析的生命特性却越来越多的出现”，生命个体并不按照某种单向线性的控制论方式行事。[6]这样，克隆人技术的强制推行必将涉及到损害生命的尊严之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如是说：“鉴于我们最为珍视的信仰和人性的观念，我自己的看法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是诞生在实验室以外的奇迹。克隆人必然要将引起人们深深的忧虑。”[7]克隆技术的重大进展不只是生命科学和遗传工程技术上的突破，在某种程度上，克隆人技术还使我们对“生与死统一”的生命观进行终极关怀的哲学思考。有生必有死，这是生命中固有的题中之义，但无论古今中外，人们总希冀生命不死与永恒，他们通过生育繁衍代代相传去承续自己的生命，不过，此生命已不是彼生命，只能实现精神永生。如今，克隆技术走上生命的舞台，它告诉人们：复制一个你，你就可以达到生命永恒的目的。这种见解不仅新颖，而且可行，令人神往。但神往归神往，其深沉的意味却值得人们好好地咀嚼。[8]克隆人技术将促使“死之淡化”和“生不足惜”，并从根本上动摇人类“生与死统一”的生命观，导致难以预料的社会后果，即当克隆人技术失去“社会引力”的制约而对生命本身进行践踏之时，生命便失去了本真价值，即为吴国盛先生所说的“当我们沉浸在物的操作和摆布之中的时候，生命的感觉却

越来越遥远。我们失重，轻飘飘地飞离大地”。[9]

从社会哲学维度来审视，由于生命的多元复杂性和不可解析性，克隆人技术虽然使得生命在强大的现代性话语体系中交付出了自己的机体，但是生命并没有完全交出自己。在这种情形之下，强制推行克隆人技术，企图以“机械之手”摆布生命特性，必将使得人们对生命真谛的原始领悟、对生命价值的文化直觉变得式微。

三、克隆人技术的人权诘问：角色转换中的人权理念

对克隆人技术进行社会哲学层面的沉思，是探究克隆人技术社会效应的必然要求。而对克隆人技术进行人权维度的考量，则是对克隆人问题哲学层面反思的进一步深化。对克隆人伦理问题的探究，不仅仅构成了生命伦理学领域中的主题，而且也关涉到当前国际社会在现代化运动中的核心价值诉求。

当前克隆人问题带来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看待启蒙运动时期确立的现代化之核心价值——尊重人的自主性、自决权等社会权益。对克隆人技术进行社会权益方面反思的最重要途径是“角色转换、换位思考”，即面对克隆人技术，我们所扮演的角色不应只是漠不关心的“旁观者”，我们还应从克隆供体，尤其是克隆人的角度进行权益维度的考量。通常改变人类禀性的行为，只要是出自当事人的自主意志，只要对他人不造成伤害与妨碍，那么伦理上便是无可厚非的，在克隆人之前的改变人类禀性的行为也基本遵循这一伦理底线。从社会层面而言，婚姻家庭制度、社会化制度对生命进程的调节是渐变的并且遵循着人类进化的客观规律；从个体层面而言，个人的品性塑造和生理修复也往往是当事人自觉自愿的举动。而克隆人技术则不同，它是今天活着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他人禀性的举动。克隆人体的行为可能符合我们“旁观者”、“克隆供体”的目的性，但未必合乎克隆人的自主性。“我们希望并要求制造‘新质的’人类，但新人未必愿做新人。”[10]这里自然就会出现一个严重的技术伦理问题——克隆人的自决权问题。一位克隆人，“由于他的基因状态是别人设定的，他的肤色、外形、智力特征都是外人决定的结果，那么在他长大成人之后，便会发现自己是他人的作品，而不是自己生命的完整的作者，这样他就很难形成因出生状态相同而与他人完全平等的道德直觉，更难把自己理解为伦理上自由的、自我决定其生命历程的主体。相反地，作为他人意志的作品所造成的侮辱感将深深地印刻在他的心灵里，伴随其终生。”[11]这样，克隆人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人类的自然禀性有无独特的道德地位，而在于我们有什么权利充当造物主，对别人的自然禀性进行改良，“道德问题在这里并非在于这种未来人的‘禀性’受到改变，而在于这种改变与未来人的自主性很难相容”。[12]

克隆人问题在今天带来的人权挑战，使得人们得以从一个全新的科技时代的视角来探讨人的社会权益的重要功能。一些人之所以试图通过基因技术实现人种培育，源于他们对人性改良的美好愿望。但克服人性的弱点与不健全，只能依靠人类自身社会机制的调节作用，而决不能以强行干涉人类的生命特性、剥夺公民的自主选择权为代价。伦理的“硬壳”——如尊重人的自主性、自决权等基本原则，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亘古而常青。任何时代科学技术都要尊重伦理的基本价值、倾听伦理的声音。[13]在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向往已逐渐成为人类普遍的精神诉求的今天，人的权益的理念、对人不得伤害的绝对命令已经构成了我们社会观念体系中的一种核心价值，它已成为我们判定一切人类行为是否合乎道德的根本尺度。如同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一样，科学自由并不意味着科学高于一切，可以不顾后果，为所欲为。科学家在判定一个研究项目之时，也必须前瞻性地顾及到实现其理论目标之途径的合法性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这种前瞻性的“责任伦理”观念“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当代社会的人类在技术时代所应拥有的一种价值诉求、精神气质与人文关怀”。[14]

四、克隆人技术的文化困境及战略选择

近代科学范式的纵深发展，就是将曾经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中行之有效的还原论与控制论用来对待生命，使得对于生命的控制开始变得行之有效，而目前的克隆人技术正是西方近代科学范式纵深发展的最强有力的证明。处在这样一种科学范式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是否应当摒弃科学无止境这一错误形上理念和技术中立的谎言，摆脱现代性话语体系和传统工业化模式的束缚，冷静地思考人类在近代科学范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自由精神的放弃、生命价值的沦丧、人文情怀的泯灭，而不是在强硬的现代性话语体系中采用一种消极的回避策略——以价值无涉和技术中立作为推托之辞。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应积极地参与和推动科学范式的转换：即从“以物理科学为代表的还原论和控制论”的

“力量型”科学范式向“尊重、鉴赏和维护生命”的绿色科学范式转换。这种科学范式转换的理论诉求反映在文化层面上，即表现为进行新的文化战略的选择——树立新的人文理念和建构新的文化模式。

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应使人与自然的更加和谐，支配克隆人技术发展的文化理念肯定是在这个思路存在着某些欠妥之处。面对克隆人的即将面世，在进行新的文化路径选择之前，我们有必要先透视一下隐藏在克隆人技术背后的错误文化理念。自人类文明开端以来，改变人的自然体及自然生命过程的努力就一直在进行，人的克隆当今被看作是基因技术的最危险的后果，然而《圣经》中“上帝造人”的过程，也就是上帝对自身的“克隆”。所以，在改变人的自然体的努力方面，基因工程的当前发展，“只是在技术手段的层面上才算得上是一次‘革命’。”[15]但是，这丝毫并不意味着基因技术在人和人类文明进化的进程中，与以前所进行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努力可以等量齐观甚至混为一谈。通过社会文化途径进行的“社会克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遵循生命演化的自然规律，更为重要的是隐藏在其后的文化理念仍是“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而当这种“社会克隆”发展到生命科学中的“技术克隆”，情形就不一样了，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克隆背后的人文理念上。具体而言，隐藏在克隆人技术中的文化困境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克隆人技术中蕴涵着使传统文明沦丧的危险。基因技术一旦发展到克隆人，一切人类文明将最后终结，因为现有文明的主体和基础——自然人和自然的家庭已经不复存在。在基因技术的发展中，人类似乎面临一个文化悖论：“为了彻底地提高人类生命和人类文明的质量，就要对人进行彻底的改良；一旦对人实现彻底的改良，人又将不复存在，至少将不再是文明的主体”。[16]其次，支配基因技术发展的文化是一种控制性文化，这种控制性的文化已经导致了人类行为选择权的急剧扩张，以至试图“人人充当上帝，成为造物主”。但是“充当上帝”的另一面是，我们像上帝那样做决定和行事，造物乃至造人，但却没有上帝那样的智慧和德性。[17]这样克隆人技术必将人类引入一个进退维谷的文化困境！

克隆人的即将出现警示人类：是该好好反思我们的文化的时候了！错误的人文理念正成为克隆人技术生长的土壤，我们应该尽快着手进行新的文化路径选择。鉴于目前克隆人技术正处于孕育之中，最紧迫的工作是如何有效而合理地防止克隆技术自发性突破文明的底线，并根据这一目标确立初级和具有基础意义的文化战略。克隆人背后的人文理念是一种典型的以科学为“文化之王”[18]的错误思想，这种思想正是引导近代科技发展的西方文化中的主要思潮，它企图与古希腊时期的文明一刀两断，以科学消解文化，从而选择了一种梁漱溟先生所指称的“文化中断”的文化策略。这种文化虽然带来了辉煌的工业文明，但近年来整个西方文明危机和技术困境也一再暴露了它的先天不足。为了弥补西方文化观念之不足，我们须将目光投向东方，尤其是中国，去探索寻找新的文化观念，解决以克隆人问题为代表的人类面临的全球文化困境。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五千年文明传承不断，特别是其中的“天人和諧”思想作为其文化精髓，可以克服近代“力量型”科学的内在缺陷，统领基因技术有序发展。具体来讲，发端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不只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觉悟，而且是整个人类文明的重大觉悟；以克隆人问题为代表的人类重大文明难题的解决，必须对这种生态觉悟进行世界性推进，即将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觉悟推进为一种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世界观，从而构建一种和谐的“科技——文化生态”。[19]之所以要将克隆人技术的文化目标锁定在和谐的“科技——文化生态”上，是因为从克隆人问题看：和谐的“科技——文化生态”可以打破人们的科技依赖心理，改变“外向性”思维方式；和谐的“科技——文化生态”可以让人们体认到生命的不可解析性，回归到对生命的原始领悟；和谐的“科技——文化生态”可以启迪人们转换角色，对克隆人技术的应用进行人权维度的诘问；和谐的“科技——文化生态”可以使人类摆脱二十世纪“科技巨人、文化侏儒”的尴尬，迎来新世纪科技与文化比翼齐飞。

参 考 文 献：

[1][5][6][9] 吴国盛.生命的飘逝[J].读书, 1997.8.

[2][3][4] 周岩.克隆人技术的文化心理思考[J].学海, 2003.3.

[7] 林平.克隆震撼[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

[8] 徐宗良.伦理思考:克隆人技术与人的生命[J].医学与哲学, 2002.9.

[10][14] 甘绍平.克隆人:不可逾越的伦理禁区[J].中国社会科学, 2003.4.

[11] 转引高兆明.克隆人权利及其诉求问题——与甘绍平先生商榷[J].中国社会科学, 2004.5.

[12] Kurt Bayertz.Der moralische Status der menschlichen Nature[M], Information Philosophy, 2002.19.

[13] 沈铭贤.科技与伦理:必要的张力[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1.

[15] [美]库尔特·拜尔茨.基因伦理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24.

[16] 樊浩.基因技术的道德哲学革命[J].中国社会科学, 2006.1.

[17][19] 参见樊浩.当代伦理精神的生态合理性[J].中国社会科学, 2001.1.

[18] [美]罗蒂.后哲学文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15.

(刘崇俊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 徐州, 221008)

*本文的一些观点得益于周岩教授的有益启迪, 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作者简介: 刘崇俊(1983-), 江苏盐城人,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哲学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 科学技术与社会, 技术社会学

王超(1958-), 江苏连云港人,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 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科学技术与社会, 经济社会学

转载自《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

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 100732 电话与传真: 0086-10-85195511
电子信箱: cassethics@yahoo.com.cn